



在稀缺资源面前拦住“黄牛”，需要制度智慧

陈知强

“30万一位，梅西会来敬酒。”随着“阿根廷男足中国行”活动日益临近，相关的网络段子也多了起来。这不，6月5日，“平安北京”通过微博辟谣，“梅西会来敬酒”？如果这30万能被骗了，那警察叔叔敬你一杯”。

这一天，阿根廷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第一轮售票开启，这场足球友谊赛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，吸引极高关注。除了部分高价票，大部分球票都在开票后“秒光”，20分钟后，全部球票售罄。

“这么多票，到底都是谁在抢啊？”我身边没买到票的球迷朋友很困惑。

不得不说，这也是我最近一直想弄明白的问题。

我不是球迷，是歌迷。5月底6月初，我最喜欢的乐队组合“五月天”在鸟巢举办演唱会。6场演出，近30万张门票，两次网络放票，均不到1分钟就显示“缺货登记”。

说实在的，对此我有心理预期，毕竟睽违3年，谁不想在现场看偶像的演出呢？但门票的紧俏程度显然超出了我的预料。售票平台上，标记过“想看”这次演唱会的人数突破了100万；还没开始卖票，就有外地歌迷打好了演出当天的机票和酒店。

在售票开启的前夜，我坐不住了，第一次到电商平台找了“代拍”。他们号称专业抢购，成功率极高，不成功费用全退。我提供了票务软件

账号，还预付了几百元费用。

随着开票倒计时归零，我在手机软件上手忙脚乱地一通乱点，幸运地在另一平台抢到了两张票，页面显示下单时间用了11秒。让我哭笑不得的是，半小时后，“专业”的代拍团队表示失败，如约退款。后来我总在想，他们究竟是真的有所谓的“技术”“经验”，还是拼概率，哪怕成功一个，也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

此后的一段时间，我经历了看演唱会以来最疯狂的票务市场。

尽管这次的票是身份证实名认证购买，但进场方式有两种，一种是纸质票，和身份证没有关联，另一种是电子票，绑定了购票者的身份证。购票平台也规定，演出开始一天前，支持转让一次。这被歌迷戏称为“黄牛”条款。

售票结束当天，大量门票就被挂在二手交易平台上，溢价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，歌迷们开始自发地抵制“黄牛”。

“是变成更好的人去见‘五月天’，不是变成更绿的韭菜去养‘黄牛’。”有人在社交平台写道。他们贴出这支乐队给场地外歌迷的回复“每场我都用力地唱，即使你们在场外也一定可以听得到”，坚定“宁可鸟巢门口站，钱也不让‘黄牛’赚”，如果“黄牛”在演出开始前卖不出去，一定会降价处理的。

原定日程有变、无法赶到现场的歌迷，也自发地把门票放到社交平台，原价转让。这无疑是在增多票务，几乎每类类似的内容下面，几分钟内就会涌入大量评论。为了获得转票，歌迷除了晒出演唱会票根、微博截图等内容以“自证身

份”，还要比拼谁的“小作文”写得更为感人，以吸引门票持有者的注意，有的甚至会写上“车票已订好，焦虑得睡不着”等内容，博取同情。

但现实依然是残酷的。随着演出日期的临近，买不到票的歌迷陆续放弃坚持，从“原价收票”变成“接受轻微溢价”，有的索性直接找“黄牛”购票。而“黄牛”挂出的价格一路走高，特别是网络订票的座位确定下来后——购票时只能选择区域，会不会离舞台更近，要看运气。好座位溢价更为严重，演出开始前10天，内场前几排标价1855元的门票被加价至万元以上。不少加价购票的人也突遭“甩单”，和他们交易的“黄牛”看到座位后后悔，涨价重新出售。

北京警方曾公布，截至5月26日，已针对“五月天”演唱会依法打击处理倒票人员29名。演出市场火爆，“黄牛”越过法律的边界，很多人的心也跟着动。一些原本买票看演出的人，在二手市场高价的诱惑下，也选择加价卖票，分一杯羹。身边的一位朋友，抱着“听说‘五月天’的门票难抢，我试试”的心态，买到了一张门票，这张标价855元的门票在5月底被人以8000多元的价格收购。一些歌迷在兴趣和利益之间选择了后者，解释“我也是溢价收的”“不为了赚钱”。

扪心自问，听说抢到一张门票就能赚一个月工资时，我内心的防线也有所松动。

这样的购票制度设计，加之一二级市场高额的价格倒挂，导致抢到票的人因稀缺资源获益。想去的去不了，不想去的偏偏拿到了票，“路人牛”甚至比职业“黄牛”更为歌迷所痛恨。

最终，我还是去了演唱会，不出意料地收获了精神上的满足。而鸟巢外，没有买到票的歌迷自发组成方阵，挥舞着荧光棒，和着场地里透出的音乐和歌声，高唱“我和我最后的倔强”。

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演出结束后，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，有歌迷买不到门票，只能付费报名演出的场地工作志愿者，“蹭听”演唱会；有的歌迷被“黄牛”骗了，就手拿对讲机假装工作人员，去骗检票口放行。

面对如此强烈的需求，我在想，是否未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的演出市场都要接受与“黄牛”共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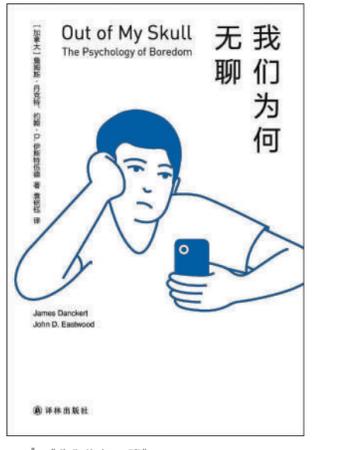
为了对付“黄牛”，一些演出实行了“强实名”，要求购票身份与入场人身份一致，在入场时刷二维码，辅以身份证和人脸识别双重认证，只有三者都符合，才进得去。这当然提升了“黄牛”转售的难度，但有观众担心，在这种制度下，如果因特殊原因无法如期到场观演，是否只能由自己承担全部损失。

无论用什么办法，希望演出主办方和监管部门行动起来，不要让重新热起来的演出市场存在这么多的混乱无序。

即将到来的“阿根廷男足中国行”比赛门票，就要求“强实名”，但它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？我朋友圈里，一个曾经加价7000多元兜售“五月天”演唱会门票的“黄牛”，此刻还在抢着这场比赛的门票。

“5分钟没进去，这是有多少人在抢票啊。”“10分钟没看到座位图，我想知道票是怎么没的。”他写道。

没想到吧，“黄牛”都抢不到票。



《我们为何无聊》【加】詹姆斯·丹克特 约翰·D·伊斯特伍德 袁铭译 译林出版社

用更有益的方式解决“无聊”

金思睿

想象这样一个场景，晚高峰的地铁上挤满了人，你要站着度过接下来的1小时。手机电量即将耗尽，你把它放进口袋。你有点累了，想屏蔽任何有关工作或未来的严肃思考，茫然地东张西望。

时间显得漫长，你看过了车厢里陌生人的脸，看过电子屏上的宣传片。一阵困意袭来，你烦躁地第四次抬头查看路线图到站地点。

被无聊找上门的感觉真不好受，但你想过吗，看似空洞乏味的它，可能在向你传达信息。

我们都曾体会过无聊，但却很难定义它。在不同人的眼中，无聊是完全不同的，“让甲感到快乐的事可能对乙来说无聊透顶”。

在《我们为何无聊》一书中，作者丹克特和伊斯特伍德从心理学出发，试图剖析无聊。他们的团队检索了各领域专家对“无聊”的定义，发现各群体之间存在惊人的一致——“无聊是一种想要、却无法参与到令人满足的活动中去的不适感”。

列夫·托尔斯泰在小说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写道：“无聊是一种对欲望的渴望。”当我们被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所吸引，它便会产生。

有人觉得无聊时，我们通常会给他一些选项，比如读书、跑步、看视频。其实，这些选项他们都考虑过，但无法投入其中。如果无聊是因为缺乏做事的动力，列出选项并不能扭转局面，“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溺水了，我们不能叫他使劲游上岸”。

人到底为什么会觉得无聊？作者给出了两种解释。一个是“欲望迷局”，即“我们无法对当前可及的事物产生欲望”；另一个是“能力不得其用”，比如，在半小时内存住数字3，又或是，让一个不懂物理学的人去听量子力学的讲座。面对这些任务，我们的技能和天赋毫无用武之地。

身体上的疼痛会引起条件反射，比如手碰到火会缩回去。“无聊”传递的信号也可以这么理解，这种心理“疼痛”暗示我们应该采取行动，而如何行动决定着无聊的后果。

这些看上去抽象的理论可以对应具象的生活。《我们为何无聊》的作者呼吁：“我们有责任以对社会和自身都更有益的方式来应对无聊。”

无聊可能造成毁灭。在美国的一起凶杀案中，3名青少年枪杀了一个出门跑步的年轻人，其中一个凶手说：“就是很无聊，没有事情可做，所以我们决定杀个人。”

它也能让人变得慷慨。研究表明，与结束一项有趣的任务相比，完成单调乏味的任务后，人们更愿意做公益，因为“无聊驱使他们寻求社会行为来重建失去的意义感”。

如今，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、诱人的、高效占据心智的工具。打开手机，网上到处是猫咪做了傻事的搞笑视频，新闻24小时不间断更新，怎么还会有人抱怨无聊呢？

事实上，科技导致了“新奇的常规化”。我们不断提高有趣的标准，最终踏上“永无止境地寻找新奇事物的仓鼠轮”，留下的还是无聊。

在短视频平台下拉屏幕核查新闻真实性简单，看猫咪视频比读深度长文轻松。越是依赖外在的事物来解决无聊，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越是被萎缩。

我们原想摆脱无聊，却作出了适得其反的选择，这听起来很矛盾，但理解其背后的信号后，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“人越是痛苦，就越是迫切地渴望解脱。”我们沉溺于网络，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很好，只是为了忘记更深层次痛苦。

恐惧无聊还有另一个理由。《倦怠社会》一书中，韩炳哲将21世纪的社会视作“功绩社会”，认为它充溢着积极性，“为了提高效率，未被填满的时间变得低效、无益，最终是无聊的”。

这么多网民，谁敢面对停滞的空白呢？怎么干掉无聊，一种说法是“仅仅是告诉无聊的人放轻松，就能减少他们当下的无聊感”。

试着回想一下，你上一次真正的放松是在什么时候？也许是在山林、海滩，或者只是躺在沙发上，看着光线在地板上移动。你的头脑是清晰的，没有惦记着工作，也没有烦恼或紧张。

放松天然使人愉悦，它与无聊相反，“没有迫切的追求，有的只是时间”。

韩炳哲认为，“精神放松的终极状态对于创造活动具有重要意义。”比如走路，有人觉得无聊，就拿出手机边走边看。也有人会发现，真正枯燥的行走方式本身。他将线型的步伐改为花哨的舞步，于是舞蹈诞生了。人们普遍认为儿童最富有想象力，可能他们更倾向于花时间去观察和想象。成年之后，我们只能看到“头上的帽子”，看不出那是“想要吞掉大象的蟒蛇”。

有趣的是，在豆瓣网评论区，针对《我们为何无聊》一书，获赞最多的评价是“果然无聊很无聊。连写无聊的书都这么无聊”。看来，这本号称凝结了团队15年心血的科学手册还是没能征服“无聊”。

真的非得干掉无聊吗？叔本华曾赞美“心存欲望的人”，“因为他们能够为之奋斗，直到欲望变成满足，再滋生新的欲望”。

最后，我们重温丹克特和伊斯特伍德的提醒：“‘无聊’抛出了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问题：你想要做什么？很少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了。”

不容忽视的药物成瘾

实习生 梁楠

冲动

16岁的韩黎两年前从河北来到北京读书，他曾一度恐惧正午时的阳光，觉得自己更适合生活在暗处的人。

他的父母在河北保定经营一家生产塑料包装袋的工厂，他们眼中的韩黎生得高高大大，是个一向懂事、乖顺的孩子，便把他交给姥姥照顾。

可父母不知道，韩黎来到北京后，独自一人承受的情绪起伏。他和过往的朋友几乎都断了联系，身边唯一的亲人姥姥，也仅仅照顾他的起居吃喝。心中的郁结难以纾解，他的情绪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。

学业上，他最烦化学，历史则是他的强项，转来北京后的第一次考试中，他出人意料地拿下了历史单科的年级第一。

这个夏天，韩黎即将参加中考。春节过后的新学期本该是段紧张备考的日子，但变数也恰恰发生在开学的前一天。

3月初，韩黎在朋友的建议和陪同下来到北京安定医院就诊，最终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。由于二人皆为未成年人，无法开取精神类药物，医生通知韩黎的父母赶来医院，他们才得知儿子的现状。

在那个混乱的夜晚，韩黎与父母大吵一架，之后他夺门而出，在药店购入了一款止咳滴丸，回到家中一口气吞下了整瓶，“想寻求刺激来减轻内心的不适感”。韩黎姥姥最先意识到了孩子的异样，她看到外孙浑浑噩噩地躺在床上，含糊不清地“说着奇怪的话”，便连忙叫来韩黎的父母。

一个月后，韩黎在B站UP主安琪的视频下写了评论，回忆那次冲动之下的“嗑药经历”：“我本人想通过‘OD’减轻自己的痛苦，第一次吃就躺床上一天不能动弹了。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痛苦，一个星期后，每天都很难受，‘OD’对人真的只有坏处，必须爱护自己的身体呀。”

“OD”

韩黎留言中的“OD”是英文“overdose”的缩写，译为过量服药。“OD”在青少年特定的圈层中成为了流行词，一小部分青少年通过服用过量药物获得精神上的麻痹，其中不乏药物成瘾者。

能让让人上瘾，这不是一件新鲜事。从罂粟中提取出的阿片类药物，既可以是强效的止痛药，也能被制成毒品。此前有媒体报道过活跃于东北迪厅的“小摇子”。“小摇子”往往从止咳水“入门”，之后便是过量服用某些止痛药，其中有些人滥用药物的终点指向了冰毒与海洛因。

韩黎在社交平台上偶然得知某款止咳药具有致幻效果，可当时，他并不知道那是人工合成的吗啡衍生物。

安琪是个勇敢的女孩。今年4月，她在网上发布了一则视频，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药物滥用的经历和感受，试图劝诫同样滥用药物的人们迷途知返。

“滥用药物后，你的快感阈值会发生改变，（以前）开心的事情也不会再让你开心了，在那之后你的生活中就只有药物。”她在视频中说。

这则视频发布后获得了400多条评论，吸引了许多像韩黎一样有着过量服药经历的人。有人心有余悸地下评论，过量服药后，自己浑身发抖、心跳过快、头痛失眠，最后以持续三四天的呕吐感和四肢无力收尾，绝对不会再干第二次；有人说，永远不要相信意志力这个东西，不能碰的就一次都别碰。

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信



2023年5月14日，在浙江省嘉兴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总站，心理老师在给学生讲解“心理图片”。



2023年5月14日，在浙江省嘉兴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总站，学生在“能力大翻转”体验区学习心理知识。



2023年5月14日，在浙江省嘉兴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总站，学生在体验“动力单车”，释放不良情绪。

息中，将药物滥用定义为：非医疗目的反复、大量地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，使用者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（瘾癖），带来严重影响他人健康及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。以韩黎超量服用的止咳药为例，相关研究表明，超量服用该药物后，会产生神智错乱、运动失调、伤害他人及自我伤害行为，而除了带来精神和躯体伤害外，超量服药甚至存在着急性药物中毒导致死亡的风险。

在一小部分青少年眼中，超量服药还是一种自残行为。

小顺同样有着超量服药的经历，但她最开始只是为了“伤害自己”。她曾经试图吞药自杀，但胃部的刺激让她把大部分吞下去的药物吐了出来。她曾加入过相约自杀的“重开群”，在那里她结识了一个朋友，答应彼此陪伴对方最后一程。她至今仍懊悔于，没能及时看到那个朋友发来了“要嗑药”的告别消息，待到她发现并给对方回信时，那面却再也没了回复。

干预

2019年6月，江西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万凯化等人在《中国药物警戒》发表文章，介绍到我国当下药物滥用的干预方式主要是戒毒干预和预防干预。

戒毒干预主要在专业的戒毒机构进行。戒毒机构将收治的药物滥用者按照急性脱毒期、康复期、巩固期3个阶段来进行分期管理，使他们从身体到心理逐步恢复正常状态，并与社会相接轨。

阻断药物滥用者与药品的接触是戒毒干预的第一步。事实上，青少年药物滥用的问

题已经得到多个部门的关注。

2023年2月，国家药监局综合司等3部门联合发文指出，近期，国内部分地区出现复方地芬诺酯片、复方曲马多片及右美沙芬口服单方制剂等药物的滥用问题，且滥用人群以青少年为主，严重危害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。

通知指出，要进一步严格控制药品生产量、加强药品生产环节监管、强化药品经营环节监管、加强寄递渠道查验，以有效遏制上述药品滥用和流入非法渠道。

落实过程中，相关药物的管控仍存漏洞。笔者走访了3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实体店，其中两家药店表示自去年起含有右美沙芬成分的药品便已缺货。在第三家药店，笔者以想购买止咳药为由，顺利购入了右美沙芬口服单方制剂。“这个药特别见效。”店员在一旁补充道。

网络购物与外卖平台上的购药流程也有不完善之处。小顺曾想买并过量服用一款处方药，该药通常被用来治疗帕金森症，在网络复诊补充处方信息的环节中，她由于年龄小没能顺利买到药物，“后来我就换了一种病，买到了那个药”。这款药物在淘宝、拼多多等平台均有售卖，在网络开方环节中仅需提供身份信息，并选择确诊疾病与过往是否服用过该药便可购得。

多种药物混用也是常见的情况之一。在这些青少年有关药物滥用的自我陈述里，所涉及的药物还包括治疗精神类疾病的药品，甚至有羟车药。

虽然药物成瘾在青少年群体中是极少数情况，但是仅仅对特定药物进行管制，对防治药物滥用，显然不够。

戒断

药物作用于人体的成瘾机制，多数与脑部髓质的精神受体有关。以部分止咳药为例，它们通过刺激相关受体来抑制咳嗽中枢的咳嗽冲动，从而产生镇咳作用，却也带来了一定的娱乐性精神效应。

2021年2月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助理教授吴世友等人基于1996—2020年发表的中文文献，对中国青少年药物滥用危害、原因和对策进行了系统综述。其中，做好青少年心理疏导、改善家庭环境、加强禁毒宣传教育是出现频次最高的三项对策及措施。

文章中指出，许多滥用药物的青少年还处于初、高中阶段，因此需要家庭、学校和社会三方联动，引导青少年们正确交友、学会拒绝毒品和不良行为等。

另一方面，药物滥用的监测工作也至关重要。目前，我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药物滥用监测系统，但监测工作主要是针对戒毒机构的收戒人员开展的，监测人群范围有待扩大，监测工作的科学性仍需提高。

2017年8月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《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（2016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。《报告》共收集有效药物滥用监测调查表276980份，在药物滥用者中，35岁及以下年龄青少年占51.7%，其中25岁及以下人群占15.5%。这份报告至今仍是官方出具的药物滥用监测最新报告。

韩黎是幸运的，他的第一次过量服药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如今，韩黎的母亲陪伴着他共同治疗双相情感障碍。

安琪正在经历第四次药物戒断，这一次，她坚持了近两个月。她希望彻底戒断，回归正常生活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韩黎、安琪、小顺为化名）